

中国不同发展水平城市间幸福指数差异 及收入对其的影响作用^{*}

王 彤 黄希庭 陈有国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摘 要: 对全国四种发展水平城市 5471 名被试的幸福感进行调查, 探讨不同发展水平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异及收入对其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 从一线到四线城市, 居民的总体和领域幸福指数都显著上升, 二、三线城市显著高于一线, 但又显著低于四线城市; 个人收入对一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无显著影响, 但对二、三、四线影响显著; 家庭人均收入对不同发展水平城市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与个人收入的影响作用完全相反, 即对一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影响不显著, 但对其它三线城市影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不同发展水平城市间在总体和领域幸福指数上均存在差异, 且不同收入对其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作用有所不同。该结论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幸福指数; 不同发展水平城市; 个人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17)02-0172-06

1 引言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黄希庭, 苏彦捷, 2010)。幸福感不仅与个体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密切相关, 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2007 年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指数”这一测量指标充分说明了其重要性。幸福感有三种类型: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黄希庭, 李继波, 刘杰, 2012), 其中, 尤以主观幸福感最能反映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 因而也最为心理学研究者所关注。主观幸福感指人们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包括情绪反应以及人们对一般生活满意度和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的判断, 其可作为衡量国家幸福指数的有效指标(Diener, 2000)。在此次研究中, 幸福指数即是对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结果。

目前, 对中国城市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显示, 2007 年十大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分别是杭州、沈阳、中山、宁波、青岛、台州、珠海、上海、北京、成都;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 2008 年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分别是香港、杭州、成都、上海、西安、大连、常州、北京、泉州、广州, 2010 年则为拉萨、辽阳、枣庄、亳州、

赤峰、上饶、扬州、周口、绥化、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全国 294 个样本城市进行幸福感调查发现, 2011 年幸福感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石家庄、临沂、扬州、承德、滨州、莱芜、鹤壁、包头、北京、新竹(袁正, 郑勇, 韩晓, 2012)。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 似乎出现了随着时间发展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居民幸福感相对降低而小城市居民幸福感相对增加的现象。然而, 由于社会学领域中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关注单个城市及其排名, 因而难以对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幸福指数进行直接对比, 因此是否的确出现了这一现象, 尚缺乏直接相关证据。

为探究这一现象是否存在, 此次研究中引入了社会学中“城市发展水平”的概念, 将全国城市按照发展水平不同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城市发展水平是反映一个地区城市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岳立, 饶斌, 2009)。目前按照城市发展水平对全国城市进行大规模系统划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顾朝林(1991)提出的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 综合考虑政治地位、城市规模、区域辐射力等指标的划分方式,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划分方式, 认为一线城市指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城市, 二线城

^{*} 基金项目: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委托项目“城市幸福指数研究”(2010CQZDW07)。

通讯作者: 黄希庭, E-mail: xthuang@swu.edu.cn。

市指1999年扩大合资试点的省会、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三线城市指有战略意义的大中城市。虽然以上两种方式对全国城市进行了系统划分,但却存在一些问题:顾朝林的划分方式由于年代久远,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已发生巨大变迁,因此其划分结果难以直接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划分只是给出了概括的描述性依据,并无具体划分结果,且其划分对象只涉及大中城市,并未涉及小城市,涵盖不够全面。因此,根据前人对城市发展水平的研究结果以及社会实际需要,此次研究中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综合考虑政治地位、城市规模和区域辐射力等因素(冯德显,贾晶,乔宁,2006;顾朝林,1991;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2011),将全国城市划分为四种发展水平,并界定如下:一线城市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二线城市指其它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部分经济发达省会城市以及经济非常发达的地级市,如南京、重庆、杭州、青岛等共计36个城市;三线城市指一、二线城市以外的其它省会城市、比较发达的地级市和在其省域单元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级市,如银川、柳州、日照等共104个城市;四线城市指一、二、三线城市以外的其它城市,包括其它地级市、县级市及县。

按照发展水平对城市的系统划分使探究不同水平城市间的幸福指数的差异成为可能。此外,由于经济水平是划分不同发展水平城市最为重要的依据,因而,对经济因素对各线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进行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以往研究已发现,收入因素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有显著正性影响,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这一影响作用将减小甚至消失,即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似乎存在一个收入临界点(Binswanger,2006;Diener & Biswas - Diener,2002;Howell & Howell,2008;Lucas & Schimmack,2009)。在不同发展水平城市间,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对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收入是否已达到收入临界点从而已不能显著影响其幸福感?相反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居民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是否仍十分明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为从经济角度改善国民幸福指数提供参考建议。

2 方法

2.1 抽样与被试构成

采用分层方便抽样,在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其它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发放问卷6000份,并回收5609份,但由于其中138个被试未填写其所在城市,故将其数据剔除,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471个。所有被试均在18岁以上且非学生。其中,466个被试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2143个被试来自南京、重庆、杭州、青岛等34个二线城市,1161个被试来自银川、柳州、日照、枣庄等61个三线城市,1701个被试来自211个四线城市。

2.2 研究工具

2.2.1 幸福指数问卷

采用刘杰、李继波和黄希庭(2012)编制的居民幸福指数问卷。该问卷包括34个条目,涵盖个体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环境生活、人际关系、文化生活以及健康状况等六个领域的幸福指数。总体幸福指数为34个条目得分的平均数。问卷采用Likert5点计分,均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其幸福指数越高。此次施测该问卷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2 各领域的Cronbach α 系数分别在0.63~0.86之间。

2.2.2 自编人口学变量问卷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健康程度、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等变量。其中,参照陆学艺(2002)对职业的划分,将职业划分为4个阶层:上层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层包括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等;下层包括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服务业人员;其它为自由职业者和无职业人员。

2.3 施测

2012年7月至10月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并回收,并于2013年1月至3月进行补测以增加样本量。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对被试进行团体或个别施测,采用统一指导语。由于文化程度、年龄等因素不便填写问卷的被试,则由主试提问并根据其口头回答代为填写。

2.4 数据处理

全部数据录入SPSS13.0软件包进行处理。

3 结果

3.1 各发展水平城市总体和领域幸福指数差异

表 1 各发展水平城市总体和各领域幸福指数得分及其差异($\bar{x} \pm s$)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F	η_p^2
总体	3.16 ± 0.50	3.33 ± 0.53	3.33 ± 0.53	3.44 ± 0.55	37.05***	0.020
经济	3.01 ± 0.71	3.20 ± 0.75	3.20 ± 0.78	3.30 ± 0.78	17.78***	0.010
政治	2.72 ± 0.81	2.91 ± 0.82	2.91 ± 0.79	3.06 ± 0.89	23.79***	0.013
文化	3.32 ± 0.66	3.41 ± 0.71	3.45 ± 0.68	3.50 ± 0.71	9.16***	0.005
人际	3.96 ± 0.51	4.03 ± 0.58	4.05 ± 0.55	4.11 ± 0.57	12.16***	0.007
健康	2.84 ± 0.75	3.03 ± 0.78	3.02 ± 0.83	3.11 ± 0.81	14.85***	0.008
环境	2.82 ± 0.71	3.04 ± 0.73	3.10 ± 0.75	3.25 ± 0.77	51.43***	0.027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从一线到四线城市,总体和领域幸福指数均呈显著上升状态(表 1)。事后比较发现,在各领域幸福指数上,二、三线城市得分间无显著差异($p > 0.05$),但两者都显著高于一线城市得分($p < 0.05$),而又显著低于四线城市得分($p < 0.05$)。在总体幸福指数得分上,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3.2 收入对各发展水平城市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及其差异

对各线城市居民个人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方差分析表明,在不同发展水平城市间,居民的个人收

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确均存在显著差异(表 2)。事后比较发现:一线城市居民在个人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上都显著高于其它三线城市($p < 0.05$);四线城市居民在两种收入上都显著低于其它三线城市($p < 0.05$);二、三线城市居民的两种收入差异不显著($p > 0.05$)。那么,收入上的差异对各线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作用如何?为探究该问题,以各线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为结果变量、以个人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为预测变量进行了分层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3、表 4、表 5 和表 6。

表 2 各发展水平城市居民收入状况及差异分析($\bar{x} \pm s$)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F	η_p^2
个人收入(万)	6.17 ± 3.85	4.52 ± 3.54	4.13 ± 3.42	3.59 ± 2.96	77.05***	0.007
家庭人均收入(万)	7.00 ± 17.05	3.62 ± 7.33	3.63 ± 8.39	2.23 ± 3.13	29.64***	0.007

表 3 不同收入对一线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影响的分层回归模型

变量	第一步(β)	第二步(β)
年龄	0.071	0.089
性别	0.060	0.073
控制变量		
婚姻状况	-0.015	-0.039
文化程度	-0.125*	-0.140**
职业	0.027	0.035
健康状况	-0.233***	-0.228***
收入		
个人收入		0.041
家庭人均收入		0.116*
R^2	0.081	0.101
ΔR^2	0.081	0.018
ΔF	6.202***	3.974*

注:各分类变量均已编码为虚拟变量。其中,男性为 0,女性为 1;未婚为 0,已婚为 1;大学及其以上为 0,大学以下为 1;中上层为 0,下层及其它为 1;没有或几乎没有健康问题为 0,有健康问题为 1。下同。

如表 3 所示,控制其它变量的影响作用后,一线

城市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仍对其总体幸福指数预测作用显著,但个人收入却不能显著预测总体幸福指数。相反地,对于其它三线城市居民,控制其它变量的影响后,个人收入对总体幸福指数的预测力仍显著,个人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但家庭人均收入的预测作用却并不显著(表 4、表 5 和表 6)。

表 4 不同收入对二线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影响的分层回归模型

变量	第一步(β)	第二步(β)
年龄	0.172***	0.168***
性别	0.053*	0.059**
控制变量		
婚姻状况	-0.018	-0.025
文化程度	0.012	-0.007
职业	-0.072**	-0.065**
健康状况	-0.242***	-0.240***
收入		
个人收入		0.46*
家庭人均收入		-0.010
R^2	0.073	0.074
ΔR^2	0.073	0.002
ΔF	25.040***	1.856

表 5 不同收入对三线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影响的分层回归模型

变量	第一步(β)	第二步(β)
控制变量	年龄	0.152***
	性别	0.041
	婚姻状况	0.112**
	文化程度	0.044
	职业	-0.061*
	健康状况	-0.174***
收入	个人收入	0.133***
	家庭人均收入	0.021
R^2	0.072	0.090
ΔR^2	0.072	0.018
ΔF	13.404***	10.215***

表 6 不同收入对四线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影响的分层回归模型

变量	第一步(β)	第二步(β)
控制变量	年龄	0.198***
	性别	0.032
	婚姻状况	0.054
	文化程度	0.045
	职业	-0.047
	健康状况	-0.234***
收入	个人收入	0.059*
	家庭人均收入	0.037
R^2	0.087	0.094
ΔR^2	0.087	0.006
ΔF	24.747***	5.401**

4 讨论

4.1 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领域和总体幸福指数差异显著

各发展水平城市在各领域和总体幸福指数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二、三线城市显著高于一线但又显著低于四线。由于总体幸福指数来源于领域幸福指数之和,因此,各线城市在总体幸福指数上的差异可能源于在各领域幸福指数上存在差异。

从经济生活满意度来看,一线城市居民经济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其它三线城市,这一结果可能源于中国正在经历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入侵(Han, 2015; Luo, Wang, & Huang, 2016),而这些现象在一线城市可能尤为明显。贫富差距以及物质主义盛行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比较并滋生更大的欲望,从而使个体更容易对收入现状不满、降低经济生活满意度(Bruni & Stanca, 2006; Solberg et al., 2002; Stutzer, 2004)。不同于一线城市,在四线城市,由于贫富差距较小,物质主义的影响也

相对较小,人们对收入现状的满意程度相对较高,因而四线城市居民表现出最高的经济生活满意度。在政治生活满意度上,由于一线城市均为比较开放的大都市,国际化交流更为便利,能吸收更多的前沿信息,公民意识也更高,对政治生活参与程度的期望也较高,因而可能更易对现状不满。此外,一线城市中存在更多的流动人口,这些人群的政治参与受限可能也是导致一线城市居民政治生活满意度较低的重要原因。文化休闲活动被证明是提升幸福感的主要策略之一(Lu & Hu, 2005)。在文化生活上,对文化活动的期望较高、消费价格过高以及时间不充裕等问题可能共同降低了一线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满意度(陶艺军, 杜鹃, 2012)。相反地,四线城市居民在文娱活动上期望较低,文娱消费价格也更为大众所接受,因此,其文化生活满意度更高。在环境生活满意度上,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背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环境污染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中尤为突出,而环境污染程度能显著预测一个国家横向与纵向的主观幸福感(陈卓咏, 2007; Welsch, 2006),因此,一线城市居民的环境生活满意度更低。而在四线城市,环境污染相对更轻,因而四线城市居民对所居住的环境满意度最高。在人际关系上,可能由于一线城市人口流动较大,并且人们安全防范意识较高,因此一线城市居民的人际关系质量要低于其它城市尤其是人口流动不大的四线城市,因而人际关系满意度较低。个体健康状况是受多因素影响的,如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以及居住的环境等均会影响健康。对于一线城市居民而言,来自多方面的生存压力可能均要大于其它城市尤其是四线城市,因而对身体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健康状况满意度会更低。由于各发展水平城市居民在各领域幸福指数上均表现出二、三线城市显著高于一线而低于四线,因而导致了各线城市在总体幸福指数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差异。

4.2 收入对各发展水平城市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

收入对各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有所差异,表现为个人收入对一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无显著影响,但对二、三、四线城市的总体幸福指数影响显著,而家庭人均收入对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模式,即对一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影响显著,但对其它三线城市的总体幸福指数影响并不显著。

个人收入对一线和其它三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

的影响作用的差异与既往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以往研究发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人收入对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影响显著,但对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Easterlin, 1974; Ma & Zhang, 2014)。对多国国家横截面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国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曲线关系,即在较为贫穷的国家,增加个人收入能有效提升幸福感,但对较为富裕的国家而言,个人收入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Veenhoven, 1991)。此外,纵向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小,如 Easterlin(1974) 发现,美国国民幸福感在 1946 ~ 1967 年间随国民收入增长而增加,但在 1970 年以后,却表现出下降趋势,且在随后的二十多年也均无显著变化。因而,来自各个层面的研究结果都倾向于表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收入临界点,当收入超过该临界点时,增加收入很难再提升幸福感。由于一线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可能由于已达到收入临界点从而导致个人收入的增加已很难有效提升其总体幸福指数。然而,在其它三线城市,可能由于居民平均收入尚未达到临界点,因此增加收入仍可显著提升二、三、四线居民的总体幸福指数。

有趣的是,尽管一线城市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个人收入同样都显著高于其它三线城市,但与个人收入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完全相反,家庭人均收入对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并不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反而表现为可显著影响一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而对其它三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可能源于以下原因: 一是在一线城市,人们要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家庭所提供的支持如经济援助对于个体尤为重要,因而家庭经济状况更可能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影响,而二、三、四线城市居民所面临的贫富差距和承受的经济压力远远小于一线城市,因此,家庭人均收入对其幸福指数未产生明显影响; 二是由于一线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贫富差距过大(表 2), 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借由家庭进行的社会比较可能尤其会对一线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Brockmann, Delhey, Welzel, & Yuan, 2009; Han, 2012)。

以上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提供参考建议: 一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需注重国民的心理幸福建设,切勿以销蚀居民幸福指数为代价; 二是对于不同发展水平城市,从经济角度提升其幸福指数可考虑不同策略,即对于一线城市,增加居民经济支

持、减少贫富差距是提升其幸福指数的有效举措,而对于其它三线城市,增加居民个人收入可以有效增加其幸福指数。然而,此次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仅仅对经济因素中的收入对各发展水平城市幸福指数的影响及其差异进行了探讨,然而,导致各线城市间幸福指数差异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其次,尽管发现了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对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在一线和其它三线城市之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模式,但这一结果的稳定性以及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1) 不同发展水平城市在总体和领域幸福指数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二、三线城市的总体和领域幸福指数显著高于一线城市,但又显著低于四线城市; (2) 不同收入对各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存在差异: 个人收入对一线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无显著影响,但对二、三、四线城市的幸福指数影响显著,相反地,家庭人均收入对一线城市的总体幸福指数影响显著,但对其它三线城市总体幸福指数并无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 陈卓咏. (2007). 中国大城市环境问题的特性及其解决. 第五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 北京.
- 冯德显, 贾晶, 乔旭宁. (2006). 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力及其评价——以郑州市为例. 地理科学, 26(3), 266-272.
- 顾朝林. (1991). 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的初步研究. 地理学报, 46(2), 129-141.
-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201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黄希庭, 李继波, 刘杰. (2012). 城市幸福指数之思考.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5), 83-91.
- 黄希庭, 苏彦捷. (2010). 心理学与人生(第二版).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刘杰, 李继波, 黄希庭. (2012). 城市幸福指数问卷的编制.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5), 92-99.
- 陆学艺.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丛书.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陶艺军, 杜鹃. (2012). 北京市民公共文化参与和需求调查分析. 调研世界, 10, 13-16.
- 袁正, 郑勇, 韩骁. (2012). 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城市问题, 5, 29-33.
- 岳立, 饶斌. (2009). 城市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及评估方法. 统计与决策, 11, 155-157.
- Binswanger, M. (2006). Why does income growth fail to make us

- happier? Searching for the treadmills behind the paradox of happiness. *The Journal of Socio - Economics*, 35(2) , 366 - 381.
- Brockmann, H. , Delhey, J. , Welzel, C. , & Yuan, H. (2009) .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0(4) , 387 - 405.
- Bruni, L. , & Stanca, L. (2006) . Income aspirations, television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Kyklos*, 59(2) , 209 - 225.
- Diener, E. (2000) . Subjective well - 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y*, 55(1) , 34 - 43.
- Diener, E. , & Biswas - Diener, R. (2002) .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7(2) , 119 - 169.
- Easterlin, R. A. (1974) .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89, 89 - 125.
- Han, C. (2012) . Satisfaction with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reform - era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2, 919 - 940.
- Han, C. (2015) . Explaining th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urban and rural Chinese: Income, personal concerns, and societal evalu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9, 179 - 190.
- Howell, R. T. , & Howell, C. J. (2008) .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status to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eta -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4) , 536.
- Lu, L. , & Hu, C. H. (2005) . Personality, leisure experiences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3) , 325 - 342.
- Lucas, R. E. , & Schimmack, U. (2009) . Income and well - being: How big is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3(1) , 75 - 78.
- Luo, Y. M. , Wang, T. , & Huang, X. T. (2016) . Which types of income matters most for well - being in China: Absolute income, relative income or income aspi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doi: 10. 1002/ijop. 12284
- Ma, Y. Z. , & Zhang, Y. (2014) . Resolution of the happiness - income parado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9(2) , 705 - 721.
- Solberg, E. C. , Diener, E. , Wirtz, D. , Wirtz, D. , Lucas, R. E. , & Oishi, S. (2002) . Wanting, having, and satisfaction: Examining the role of desire discrepancies in satisfaction with inco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3) , 725 - 734.
- Stutzer, A. (2004) . The role of income aspirations in individual happi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4(1) , 89 - 109.
- Veenhoven, R. (1991) .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1) , 1 - 34.
- Welsch, H. (2006) . Environment and happiness: Valuation of air pollution using life satisfaction data. *Ecological Economics*, 58(4) , 801 - 813.

The Well - being Index Differences in Cities with Different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Wang Tong Huang Xiting Chen Youguo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We aimed to study if there ar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well - being index in the citie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in China. Besid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city classification, we also explored how the income(personal income and family income per capita) related to well - being index in different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cities.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including 5,471 participants come from 31 provinces of China(exclude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as investigated with Residents Well - being Index Questionnaire(RWIQ)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 of 4 types of cities. Specifically, the score on general and domain well - being index of second - tier and third - tier cities both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first - tier cities but lower than fourth - tier cities. In addition, family income per capita could predicate the general well - being index in first - tier cities significantly but had no notable correlation with other cities' general well - being index. Conversely, personal income predicated the general well - being index in other three types of cities significantly but uncorrelated with the general well - being index in first - tier cities. These results may provide some advices for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well - being index; cities with different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personal income; family income per capita